



百事·百卷·百年——中共党史大型普及丛书
中共党史资政专题史书系（民主革命时期）

从延安整风到 党的七大

章猷才 时新华 葛丽 尹传政 著

气势恢宏 大气磅礴

党史教育的大众精品
资政育人的权威阐释

齐东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百事·百卷·百年——中共党史大型普及丛书
中共党史资政专题史书系（民主革命时期）

从延安整风到 党的七大

章猷才 时新华 葛丽 尹传政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 / 章猷才等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6.1

(中共党史资政专题史书系 / 丁少伦主编. 民主革命时期)

ISBN 978-7-5488-1972-1

I. ①从… II. ①章… III. ①延安整风运动—史料
②中共七大(1945)—史料 IV. ①D264②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719号

出版人: 崔刚

策划人: 丁少伦

责任编辑: 赵志坚 张倩妹 刘洁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

邮编: 250002

印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规格: 170毫米×240毫米 1/16

印张: 9.75

字数: 162千字

定价: 38.00元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可随时调换)

百事·百卷·百年

——中共党史大型普及丛书

中共党史资政专题史书系（民主革命时期）

百事·百卷·百年——中共党史大型普及丛书
中共党史资政专题史书系（民主革命时期）

编委会

主 任：谭延伟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少伦 于化庭 李 蓉 姚金果

崔 刚 章猷才 董宝训

策划人：丁少伦

组稿人：丁少伦 张元立

目 录

第一章 十月长征	(001)
第一节 毛泽东落卧东华山	(001)
第二节 “红房子”的主人	(015)
第三节 决意突围	(020)
第二章 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026)
第一节 “饮水思源”	(026)
第二节 长江局与延安的矛盾	(033)
第三节 三月政治局会议再发难	(037)
第三章 “左”冲右突下的中国共产党	(045)
第一节 季米特洛夫的“口信”	(045)
第二节 蒋介石抗日与反共的两面政策	(050)
第三节 共产国际解散的风波	(058)
第四章 延安整风的理论准备	(066)
第一节 没有历史知识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068)
第二节 五五学习节	(075)
第三节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080)
第五章 一次普遍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086)
第一节 高干整风先行一步	(086)
第二节 “九月会议”初步统一思想	(090)

第三节 延安文艺界整风	(095)
第四节 西北局高干会议	(102)
第六章 延安整风的影响	(108)
第一节 “我向大家赔不是”	(108)
第二节 历史经验要总结	(115)
第三节 分清是非，统一思想	(119)
第四节 蒋介石的反省	(125)
第七章 高举旗帜，夺取新胜利	(132)
第一节 赫尔利的背弃	(132)
第二节 万众瞩目清凉山	(139)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高高飘扬	(146)
参考文献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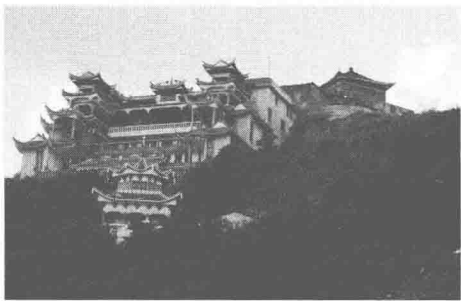
十月长征

在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后，毛泽东及时总结了革命经验教训，经过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决定将革命斗争引入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出了“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革命思想。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示范作用下，鄂豫皖、左右江、洪湖等根据地相继建立，形成了星星之火燎原之势，中国革命走出了国民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期，重新焕发生机。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开始抬头，一度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使党的革命斗争方针、策略背离了中国实际国情。然而，这些错误的斗争路线、方针更多地指向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内的正确领导，不仅使毛泽东本人在党内的职务受到了冲击，还使千万革命志士用鲜血和汗水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下丧失殆尽，红军被迫放弃，最终进行长征突围。

第一节 毛泽东落卧东华山

东华山，在江西瑞金以东十余里的地方，距叶坪谢家宗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只有四里路，属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在该地进行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毛泽东的这次休养，虽然有长期的革命征战导致身体难以承受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他被党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打击，压力过大而病倒。从井冈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成，一时间让人看到了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理应接

受毛泽东的正确革命主张，让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以王明为首的“左”派推行错误路线，毛泽东再次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东华山

在1927年9月9日举行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先后两次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先由攻打长沙转向浏阳县文家市集结，再由永新县三湾村向井冈山进发。虽然这样的行动最终招致了“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已经在井冈山落下脚来的毛泽东不仅没有受到表扬，反而受到严厉的处分，他又一次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①，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毛泽东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决心。他恢复了该地区的党组织；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与朱德等南昌起义的部队共同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等等。这样，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一条改变中国命运的新的革命道路初步探索成功。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犹如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起来。到1930年上半年，井冈山、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左右江、东江、湘赣、闽西、赣东北、琼崖等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红军已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等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城市的偏僻地区。^② 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领导革命的道路。而作为中共上一级领导机构的共产国际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要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指导中共如何开展武装斗争。

^①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11。

^② 谭克绳，中国革命根据地史：上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2。



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这里，我们必须简单交代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共产国际就是第三国际，它于1919年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虽然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就成立了，而且成立时曾接受过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等人的指导，并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还直接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但时隔一年后，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才正式作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为此还专门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表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对于各国的加入有明确的规定，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才可以加入：“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的以往策略的党，在没有加入以前必须设法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最重要的中央机构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等等。显然，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对共产国际做出的各项指示都必须执行，对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人也都必须接受。应当说，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初期给予了巨大帮助，包括理论、组织、人事等方面，尤其是经费上，“到1927年，各项经费加起来，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已不下100万美元之数了”^①。这些帮助对中共的早期成长起了

^①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真实关系。北京日报，2011-05-18（4）。



列宁在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上

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每一项指导和帮助未必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对中共的人事调整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例。而党中央的这场人事上的变动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毛泽东等人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的正确革命路线，甚至还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走到了失败的边缘。

为什么共产国际要在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共做出人事调整呢？这缘于“立三路线”的问题。“八七”会议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但助长了党内的“左”倾思潮。瞿秋白、李立三成为新的党中央领导，他们为了唤起革命的高潮而执行了激进的路线，被称为“左”倾路线，又称“立三路线”。“立三路线”中关于富农政策的问题引发了当时国内中央领导人包括蔡和森等人的反对。共产国际一方面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力量发生路线分歧，以致削弱党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执行自己的路线，这就需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回到中国去解决这两个问题。米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恰恰看上了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1929年2月初，米夫和瞿秋白找王明谈话：“你不是很久就想回国去工作吗？现在听说李立三和蔡和森关于富农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李立三把蔡和森的政治局委员都开除了，和森正在动身到莫斯科来。中共代表团和国际东方部准备写一封信（主要关于富农问题），但等信写好，还要等通过，要几个月后，才能送去。因此，要你回去告诉中央，不要再争论这个问题了。他们都知道你在国际工作，会相信的。因而派你回去传达。”^①

王明原以为可以借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国内大干一场，可是回到国内后

^① 郭德宏：《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0。

的境遇与原来的想象有天壤之别，有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李立三根本没有把王明当回事，从几个事例就可见一斑。一是当时中共中央提出让王明去根据地工作，“但他不愿意，愿意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因为“王明回国后，不愿意到基层工作，坚持要留在中央机关，一心一意想当领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二是李立三直接将王明“分配到几个基层工厂（即浦东区南洋烟厂）去做党的支部书记”。李立三曾明确地告诉过王明：“你虽然在莫斯科学习过，但没有工作经验，要到最下层、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三是为了在基层锻炼王明，李立三安排给王明一个最不起眼的工作，即做《红旗》报的通讯员，“但当绍禹找到沪西后，才知道已有了通讯员高三杰同志。高同志说：‘我要半年以后才能离开。你是来做候补通讯员的，是给我做助手的。你的任务是每天领来报纸，送发报纸。每早六时到北四川路青年会拿《上海日报》（李求实主编的），拿70份左右。一半我分给区委，另一半由你自己到工厂、街道等处去贴散。《上海日报》是秘密的，要善于躲避敌人。在电车上把报纸放在足下。时常有敌人来搜查，要小心……’”。^①四是李立三对王明接连进行了几次打击。第一次是1930年1月12日，王明参加上海工联会在垃圾桥附近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工会干部会议时被捕，王明认为“立三早已知道开会的地点被敌人破坏过，但他们仍然叫别人去‘争取公开’，他们自己不愿去争”^②；第二次是1930年2月18日，王明被宣布保释后，李立三认定如果发现王明叛变的疑点后，就将其枪决；第三次是1930年3月，李立三想让王明到豫皖苏区并准备杀掉他。对于自己所遭受的境遇，王明通过给共产国际写信表达了对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的不满，“抱怨中共中央把他丢到了脑后”。这些触怒了他在莫斯科的恩师、领导及盟友米夫，使米夫大发雷霆，“他在四中全会前给中共中央信中，赞扬陈绍禹的英雄主义并称他是英勇革命者的典范，攻击李立三等领导不给陈安排重要职务”^③。

接下来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让王明逐渐积攒起了挑战李立三资本。

首先，共产国际的来信让王明正身。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给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书》，对如何对待富农的问题进行了说明。王明乘势对共产国际“左”倾主张进行了积极宣传，借此包装自己

① 郭德宏：《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9。

② 郭德宏：《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31。

③ 郭德宏：《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35。



王明

的共产国际代言人的身份，企图获得党内的领导职务。

其次，“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宗派的形成让王明有了坚定的盟友。1929年6月17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中山大学举行全校大会。这次大会是王明曾注入大量心血的中山大学支部局打着反对瞿秋白的旗号，实际上是米夫和王明、博古一帮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排除异己的活动。这场斗争的结局表面上支部局获得了胜利，但米夫被调离了中山大学，去了东方部。这样一个在米夫指导下，以王明、博古及夏曦等为首的宗派小团体形成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联合起来，更多的是由于他们思想立场的一致，而不是由于有任何正式的组织。他们也无需单独成立组织，因为他们控制了党支部局，且有俄国当局支持他们。而且，这一集团没有公认的领袖。他们大多学科成绩优良，在中山大学的党务、教务和行政工作方面都既能干又积极。他们俄语讲得很好，使他们在校园内外能和俄国人有着广泛的接触，一般俄国人对他们怀有良好的印象。尽管这样，除了陈绍禹一人，米夫对他早就予以重视而外，在这场斗争开展之前，米夫并没有特别挑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任何人作为他的集团成员。米夫没有创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①事实上，通过这场斗争，米夫认识到了这批来自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不过是由于他们在中山大学斗争中表现突出，为米夫所看中，当成一支对他有用的有训练的力量罢了”^②。这场斗争还进一步密切了这部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同米夫的关系，“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

①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221—222。

②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222。

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部，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①。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后来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一举将王明、博古等人带入中共领导层了。

作为王明坚定盟友的博古，原名秦邦宪，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他去莫斯科的初衷是学习革命理论，但其本人“去啃完全脱离实际的教科书”，导致“严重地脱离实际，只会用从这些教科书上摘句寻章得来的马列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和俄国编写者根据政治需要归纳出来的生硬教条来判断一切，他们并不清楚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是怎么一回事。一拨接一拨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又时时提醒他们要站稳立场，理解和把握‘领导同志’的言论意图成为决定的关键，20岁出头的博古自然沾染了一套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倾向”。^②



博古

再者，自己的盟友纷纷回国，有了以共产国际为支撑的可靠联盟，王明已不再孤军奋战。1930年初，“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博古回到了国内，巧合的是与王明一起被组织上安排到了全国总工会的宣传部工作，任《劳动》的编辑。王明到了全国总工会后，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身份属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他很信任。只有像他这样的真正懂理论的布尔什维克，才能担当起中央的领导任务，希望全总的同志支持他的工作”^③。王明还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④王明、博古担任宣传工作，为公开反对李立三提供了便利。

① 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36—37。

② 郭德宏。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8。

③ 郭德宏。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36。

④ 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华文摘，1981（5）。

1930年4月5日，李立三在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发表了《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提出了极左的思想路线：“最近政治事变与革命形势的发展，已显示出全国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因此在准备全国革命的胜利的任务之下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首先要有全国的配合，要有中心城市工人的政治罢工、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暴动，要有农民暴动、士兵哗变、红军的有力进攻”。可见，这种路线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在全国大搞公开的暴动，“明确认为暴动一开始就绝无局部胜利之可能，必然形成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决战，就是苏联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必须立即做决战的准备”^①。事实上，“立三路线”不仅“使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工作和工人斗争受到严重的挫折和破坏，使红军和农村根据地遭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危害”^②，还“不符合斯大林一心想要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也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应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③。这样，“立三路线”的推行不仅引起了执行正确路线的其他党中央领导人的反对，也给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博古等人提供了向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发难的机会，因为他们“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④。

李立三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王明就公开反对“立三路线”，“因为在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和《红旗》上发表了李立三的几篇带原则错误的论文”^⑤。王明先后找到项英、向忠发等中央领导进行了数次情况的反映，并让其转告李立三本人所犯的错误，但李立三不听。与此同时，王明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宣传资源，刊文批评李立三的错误主张。4月10日，在《劳动》第28期上，王明分别以“兆雨”“石”“慕”和“玉”的笔名发表了四篇文章，即《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和教训》《“四一二”与蒋介石》《汉口蛋厂的同盟罢工》和《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事实上，李立三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左”的错误，可王明的思想从根本上更“左”。

6月初，王明调任李立三为部长的中宣部任秘书工作，并同归国的王稼祥（当时在中宣部工作）、博古、何子述等人找李立三谈话，希望他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向中央反映不要把李立三的错误意见采纳到中央决议中去。6月11日，

① 杨奎松.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29.

② 戴茂林，曹仲彬. 王明传.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320.

③ 杨奎松.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29.

④ 杨奎松.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29.

⑤ 郭德宏. 王明年谱.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38.

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标志着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王明不仅公开反对李立三，还不断向米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状告李立三。王明在给米夫的信中就不断诉说自己的遭遇：“在你的几次发言时老板指出了你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要求不仅做出口头声明，而且做出书面声明，但你既没有以口头形式也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而肯定地承认你在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派别活动分子。这意味着你对老板批评的错误承认得很不诚恳，相反，你以手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老板近来收到报告说，你给巴黎写了信，其中说老板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行，通知马克松、伯格涅尔、康穆松（何子述、秦邦宪、王稼祥）不久回国。这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你的派别活动……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马克松、伯格涅尔、康穆松）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的危险！当然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开始。”^①

王明和博古一起找到王稼祥、何子述，了解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反对6月11日决议时，就提出：“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②显然，围绕王明形成了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反对“立三路线”的小团体。

7月9日，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王明、博古等人相继对中央政治局6月11日的决议提出了意见。李立三对此非常恼火，便将王明、博古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等帽子，并由向忠发宣布撤销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王明等人对各方尤其是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态度早已心中有数，所以在受到打击后，并没有气馁，而是不断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诉冤。7月10日，王明以韶玉的名义给中央写信痛陈李立三的错误。7月22日、24日，王明和王稼祥给米夫写信。恰巧的是米夫在7月底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局新的领导人。在8月3日至5日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上，李立三、向忠发等人要求开除王明、博古等人的党籍，最后在远东局代表的坚持下，给予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及其他三人严重警告的处分。王明被调出中宣部，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何子述被派往北方；王稼

① 陈绍禹给米夫的信，资料丛书：第9册。209—210。

② 朱仲丽。黎明和晚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907。

祥被派往南方；博古留在了上海。与此同时，王明继续给共产国际写信汇报情况。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的领导下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这次会议之后，王明和博古的一切工作都被取消了。王明又在10月接连两次给共产国际的米夫等人写信，否定中央的决定。王明的这次写信起到了很大作用。共产国际在10月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直指“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是机会主义的。在这次来信中，共产国际表达了相当的不满，除了有李立三的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信任的陈绍禹等人，六届三中全会没有重用。……把瞿秋白赶下台，以便扶植陈绍禹上台，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执行”^①。显然，“十月来信”加强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共的政治地位”^②。

11月中旬，米夫来到了中国，直接参与党中央领导人选事宜。他来的根本使命是“用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拉进中共中央的办法，来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③。米夫打着反对右倾的旗号，首先重提李立三问题的错误，抛出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其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高度赞扬王明等人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借此吹嘘王明忠于共产国际的思想。正是在米夫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在12月16日通过了《关于取消陈绍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又在23日向全党发出了《紧急通知——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事实上，这就为王明、博古等人进入中央扫清了障碍。

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如愿以偿地进入中央领导岗位。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导下，在远离中央根据地的上海秘密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调整中央领导层的人事安排，重新选举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就在召开四中全会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李立三政治局委员职务，撤销瞿秋白政治局委员职务。米夫借远东局之名还拟定了一个中央领导名单。最终结果是瞿秋白、李立三等退出政治局，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

① 于吉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陈绍禹上台，中共党史专题讲义，123。

②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61。

③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163。